



“人的文学”：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 与新文学的发生

“Human Literature”:

Modern Humanitarian in the May Fourth Era
and the Occurren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张先飞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人的文学”：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 与新文学的发生

“Human Literature”:

Modern Humanitarian in the May Fourth Era
and the Occurren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张先飞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王欢欢

版式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张先飞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1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6269-0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新文学(五四)-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7100 号

“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

REN DE WENXUE WUSI XIANDAI RENDAO ZHUYI YU XINWENXUE DE FASHENG

张先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7-01-016269-0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一剑十年磨，自 2009 年后，张先飞又一部新著《“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即将付梓，作为老师又要为之再次书序，一时之间感怀颇多。最大的感触：“慢”！关于一个课题累积思考十数年，迟迟不肯动笔。这一过程，往往要承受世俗利益或多或少的损失，与被业界同仁遗忘的寂寞。但张先飞却不惮于和人比“慢”，这实在令人感动。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学术的信仰，或如解志熙先生的善意戏言，太把学问当回事了。是的，学问一定要当回事，不仅需要信仰，更要有痴迷与投入，与之必然相连的，就是付出与牺牲，但真正坚守的学者必会以此为乐，以此为幸的。

张先飞是一个有着学术雄心的学人，跟从着任访秋先生所开创的道路，孜孜专注于“五四”文学史研究。他常同我谈到的学术计划，就是重写“五四”文学史。已经完成的《“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与《“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这两部专著只是其中的开篇之作，针对新文学的渊源问题、发生问题，以兹作为破解“五四”新文学，乃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应该说，张先飞的这一学术功课是合格的，这两部专著业已成为新文学渊源、新文学发生研究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推进之作，不仅寻找到了解开新文学何以兴起之谜的关键要点，即张先飞所独立挖掘的“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的思潮运动，而且能够考镜源流，将初期新文学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学思潮运动形态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发掘，作出全局性视角的再现，尤其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归纳出完整的“五四”思想史、文学史的观念统系……这种学术贡献是不容小觑的。通过以上成果，张先飞关于“五四”文学史研究的框架已经逐步隐现，我十分期待其完整的成果早日贡献学界。

新文学渊源是河南大学近现代文学研究的首要方向，张先飞的学术成绩深深得益于不舍斋主人任访秋先生的思考，他称任访秋先生 40 年代初写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与 80 年代初完成的《中国新文学渊源》，是其筐中秘笈。回顾先师任访秋先生的学术道路，任先生基于其厚实根基、广阔视野、平正态度，既能于大处着眼，又善于深窥精微细致处，特别是悠游出入于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研究领域，因此总能理据充分地大量学术难题确切定案。虽囿于时代动荡与个人遭际，先生未能尽展才力，生前未完全

落实其宏伟设想,但先生为后学小子开拓宽阔新途,仍然功莫大焉。在我看来,张先飞研究进展的一个秘诀,便是不做无根的探索,看重对前辈用心的悉心揣摩,力图接着任访秋先生的思考继续讲下去,在此过程中勉力创造。我觉得,尊重前贤,无非是在尊重学术,本意是继承与超越,与膜拜迷信没有一丝关联,张先飞看来对此已有所体悟。

张先飞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承续河南大学学术传统中对近现代文学史料文献学方法的自觉,他不仅悉心实践,而且多次借《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史学月刊》等文史研究阵地,以及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等重要活动中,向学界郑重申明在研究工作中不断获取的点滴心得。张先飞一直强调扎牢学术根基,并围绕近现代文学史料文献学多方探索,业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实践认知与工作方法,其多年的心得与成果将汇铸成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和他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有时对当下近现代文学专业史料工作的评价与态度稍显峻急,其实只是在说些老实话,是对当前的学风哀其不端正、恨其不进取,且更为不满不符专业性要求的史料工作,戏称之为“破坏式发掘”与“发掘式破坏”。说到底,张先飞只是在坚持一种老实守拙的学风,并非过高的苛刻要求。

张先飞的研究,皆因有此“保守”,方能有所创新,很多思考结论因之令人欣喜。如基于实证重释鲁迅、周作人“五四”复出的学术难题,对周氏兄弟虽在理性上做出“下去”即为“上去”的爽快抉择,但又在社会实践中欲进还退、欲退还进的犹疑矛盾心态等的细致揣摩,就很能令人信服,是纠正近年来某些中青年学者玄学化鲁迅、周作人研究之风的良方。另有对“新青年”派素不为人知的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现象的揭示,让人耳目一新,其所得新见是对常见文献细加爬梳的结果。此外,把前期文学研究会归入“新村”式的理想化的人道主义社会改造小组织,并首次将周作人、俞平伯、郑振铎、叶绍钧、沈雁冰、张闻天、耿济之等对“人的文学”文艺观独特本质论、功用论的认知,清晰、完整地呈现于学界,相信同仁们是很难漠视这样的重要发现的。而张先飞对初期新文学创作活动的释读,更显示出将考据辨证、思想考察、艺术分析有机融合的效力,使我们对于初期新文学“人”的发现与新情感、感觉世界的发现,以及此过程中周作人、叶绍钧、鲁迅、朱自清、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胡适、许地山、谢冰心、王统照等创作活动的理解,获得全新认识,给予初期新文学家的艰辛努力以准确的释读与中肯的评判,由此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文学史的写作活动。

这一工作已显示出张先飞总体性的研究特点,即看重对现代文学专业

基础性问题的重新思考与“再出发”的研究。由于受到任访秋、刘增杰、解志熙等诸位先生的影响,张先飞形成了对专业发展的固定认知。在他看来,现代文学专业自初创学科以来,始终是在磕磕绊绊的艰难道路上迈进,诸多困境阻碍了专业的基础性建设,更可怕的是,产生了较多模糊的认识,以致令很多研究活动,距离当初朱自清、鲁迅、胡适、苏雪林等先生的研究设想、实践,以及“古典化”、“历史化”的要求愈行愈远。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不断有研究者乐观地大声宣告:对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研究业已十分成熟,土地翻耕无数,至今无荒可开、无地可耕,因之,后来者只能够望洋兴叹,做些翻耕熟荒、修缺补漏的工作。但实际的情况绝非如此,如从文学史学科发展的专业化角度审视,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已经无事可做,恰是荒田无尽、沃土待耕。而从严格历史学研究的规范及要求出发,重新审视以往关于专业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并作出“再出发”式的探索,更是重中之重,因为这些才是重建现代文学学科架构的龙骨、钢架。这样的严肃思考与端正态度,成为张先飞研究工作开展的基础性认识。实际上也是对河南大学近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传统的进一步的探索与发展。

行文于此,我想要郑重介绍一下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河大学风”,这是由任访秋、刘增杰、赵明、王文金、刘思谦等诸位先生,以及吾辈学人解志熙、沈卫威、张宝明等开创的学术风气,是对民国以来优良学术传统的有意传承与发扬。向上直承太炎先生、周氏兄弟、胡适、钱玄同、赵纪彬,此后包括王瑶、唐弢、李何林等,形成一种宽阔、优容的,颇具包容性、参与性,又极重思想史、学术史修识的特有的学术作风与气派,使河南大学近现代文学学科成为富于营养的培养基,能够不断培育出较为全面的优才,这是河南大学对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点贡献。而作为后学的张先飞,其学术成长也充分得益于兹。盼望他的未来学术道路,既能严格恪守前辈学者对学术工作的信仰,同时又能真正继承他们广益多师、不限门墙、祛伪存真、崇尚创造的学养和气魄,完成更多无愧前辈的耕作。这也是我们作为老师对于张先飞,以及这个学科的殷切期盼。

是为序。

关爱和

2016年6月1日于开封河南大学

目 录

序	关爱和 1
导 论	1
第一章 从启动到共识：“五四”人道主义与“人的文学”的同源并起 ...	10
第一节 现代人道主义运动的源起	10
一、“尼采思路”与周氏兄弟“下去”观	12
二、知识界的二次“陡转”与周氏兄弟的复出	17
第二节 “新青年”派人道主义的公同信仰	27
一、“人的文学”的意义：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的发轫	28
二、“新青年”派人道主义的总体转向	31
三、“公同信仰”的形成：人道主义思潮运动的认识基础	46
第二章 “五四”“人的文学”文艺观念的建构	52
——兼论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观在“五四”中国的实现与变体	
第一节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的系统解析	53
一、“人的文学”的本质及类型：“为主义的艺术”	54
二、“人的文学”的特性：理想的“平民的文学”	64
三、“人的文学”的文艺功能论	67
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对“人的文学”文艺观的阐释与延展	77
一、俞平伯：“教条论”托尔斯泰主义者“进化的还原论”	78
二、郑振铎、叶绍钧、沈雁冰：“人的文学”原理的思考	89
第三章 “人间性”的发现：初期新文学的主题与形态	107
第一节 理想“人”、“人的生活”观的觉悟	109
一、这也是一个人	109
二、这不是一个“人”	111

三、这也能成为一个“人”：“人的文学”的“抹布”主题	112
四、“爱的奇迹”：“人”的觉醒体验的文学表现	115
第二节 “人间感”的觉悟	125
一、“五四”人道主义与“人间感”的塑造	125
二、“人间感”的开启：人类兄弟灵魂光辉的“神圣”感受	129
三、“人间感”发现、塑造的周作人范式：人类兄弟间“爱”的 联系	134
四、叶绍钧：“爱的生命”的创造进化与阻隔	163
参考文献	169
后 记	183

导 论

一、研究思路

本著作所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独立发展阶段——初期新文学的发生学与形态学。首先需要说明,一直以来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界对“五四”前期盛行的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思潮运动缺乏全面清楚的认识,^①直至拙著《“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后,才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著者发现,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是破解初期新文学发生与形态生成之谜的秘钥。对其进行深入考辩,可以清晰看到,新文学的发生活动是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整体思潮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最早具有独立系统理论形态与丰富完整创作实践的初期新文学,正是这一思潮运动的重要产物。如初期新文学的理论形态是以理想“人”、理想“人的生活”实现为鹄的,为人道主义理想社会改造服务的文艺观构造;而初期新文学的创作实践,是对现代人道主义者的“人间性”发现的艺术塑型,由此创造出新的文学主题与形态。初期新文学主题、形态的创造可分作两个层面,其一,是对理想“人”、“人的生活”理念,以及“人”的觉醒体验的文学表现;其二,是将现代人道主义“新”人的新情感、新感觉以全新文学形态固定下来。

初期新文学家均以“人的文学”来为自身所信仰的文学观念与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命名,他们骄傲地宣布“人的文学”与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运动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且毫不掩饰其凭借文艺为人道主义社会理想服务的理论及创作原则。实际上,新文学家的志向更为高远,他们立意发扬光大晚年列夫·托尔斯泰开创的伟大事业,欲为人类创造一种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的全新文学样式、文学标准与文学传统。这些都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景象。总体而言,发生于“五四”前期的初期新文学虽尚未取得整体性的巨大成就,却也贡献出了具有独立系统理论形态与丰富完整创作形态的“人的文学”,并非像很多文学史家所宣称的那样:初期新文学仅是一批幼稚的新文学家的笨拙探险,或是思想革新家们硬着头皮在为以

^① 本书对“五四”的时间划定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五四”前期划界至1922年。

后专门的文学家披荆斩棘、摸索道路,这些判断太过小觑“人的文学”家们的文艺创造能力与创作实绩。

本书由《导论》及三章组成,即“人的文学”文艺运动的“发生篇”、“文论篇”与“创作篇”,力求整体描述“人的文学”是如何从“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中产生出来,并完成对独立系统理论形态与丰富完整创作形态的创造。现代人道主义思潮与“人的文学”文艺运动的首倡者、首要核心人物皆为周氏兄弟,他们不仅从西方引入了现代人道主义的基础理念,同时又积极推进现代人道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力图建构起系统完整的社会观、“人学”观与文艺观,并成为人道主义文学创作形态最重要的塑型人。鉴于此,本书从周氏兄弟如何步入新文化运动战阵开始讲述,以追溯本土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与“人的文学”文艺运动发生的起点,这是作为“发生篇”的第一章《从启动到共识:“五四”人道主义与“人的文学”的同源并起》第一节《现代人道主义运动的源起》的主要内容。本节试图解决近现代中国文学及思想史的关键性难题,集中探求作为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及“人的文学”文艺运动核心人物的周氏兄弟,自愿走出精神“退隐”,转而投身新的社会变革的个体心理动因与外部思潮原因,挖掘其抉择的真实含义与新的自我身份定位,并梳理思想演变的完整历程。著者发现1918年前后周氏兄弟受到两条重要思路强烈触动,其一,“下去”即为“上去”的“尼采思路”为周氏兄弟提供了理论上的驱动力;^①其二,在民初知识界第二次思想“陡转”中梁漱溟、蔡元培等智识者富于强烈道德自许和道义担当的思想行动,以及“一战”后新的世界大势的强烈冲击与启示,都促使深受“中国问题”困扰的周氏兄弟最终做出投身社会变革的抉择,也就是他们的“下去”。

随即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作为社会改造思潮运动的“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潮流是如何开启一场新的文学运动的,这是第二节《“新青年”派人道主义的公同信仰》所要着重解决的。这一问题的关节点,是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思潮运动的兴起,这是“新青年”派人道主义集体转向后新知识界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形成的结果,这一“公同信仰”很快成为众多社会改造群体活动的共同理论支撑与行动纲领,指引了“五四”前期社会变革进程、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而文学运动只是众多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活动中的一类。作为“人的文学”文艺运动主体的前期文学研究会,便是“新村”式的社会改造的理想小组织,其成

① [德]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唐俟(鲁迅)译,1920年9月1日《新潮》第2卷第5号。

员以文艺活动的方式投身根本改造世界的大业。新知识界现代人道主义的“公同信仰”一方面促动了“人的文学”文艺活动的发生,另一方面为“人的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坚实强劲的动力来源,在此基础上“人的文学”家们不仅在文艺观念上作出全新创造,同时也在文艺创作上开启了“人间性”文学的新篇章。

“人的文学”的首要成就,是创构为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服务的系统文艺思想,这是作为“文论篇”的第二章《“五四”“人的文学”文艺观念的建构》的主要研究内容。著者在第一节《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的系统解析》中说明,作为首倡者与首席理论家的周作人身处“人的文学”文艺观建构的枢纽地位,他在接受、修正、改造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观基础上,受到新世纪世界文学思想、实践的启示,同时吸收西方人类学、神话学最新成果,率先从文艺本质及类型、文艺基本特性、文艺功能论等方面进行理论创构。周作人首先提出,“人的文学”的本质是“为主义的艺术”,此为新文艺观建构的首要前提,揭示出“人的文学”作为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有机组构与有力推手的重要事实。周作人紧接着指出,“人的文学”具有道德的普遍性与“以真为主”的特性;最为重要的是,“人的文学”具有推进人类普遍团结的独特功用,而这原本就是文艺固有的属性。此外,在整体理论建构过程中,周作人特别强调“人的文学”的本质及类型、基本特性、独特功用等均具有科学依据,它们的形成正是人类文学最新进化的结果,周作人是以人类学、神话学等最新科学成果作为其文艺论建构的强大理论支撑。总之,周作人建构起“人的文学”文艺观的基本架构与逻辑思路,初步确立了初期新文学理论、创作的基本准则及方向。

第二节是《文学研究会对“人的文学”文艺观的阐释与延展》,描述了在列夫·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文艺观与周作人“人的文学”文艺观启示、引导下,作为“人的文学”文艺运动核心的前期文学研究会对于文艺观念建构的贡献。俞平伯、郑振铎、叶绍钧、沈雁冰、耿济之、张闻天等不仅坚信全面根本解决人类问题的社会理想必将实现,而且还力图为人道主义理想社会设计构建出一个“诗底共和国”。其中俞平伯就是晚期列夫·托尔斯泰“为主义的艺术”理论的最忠实信徒与深度解说者,他强调要不作变更地完整接受与实现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观,并以“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的系统阐发完成了对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表达,同时进一步强化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观念所固有的极端理想主义与教条化色彩。相形之下,郑振铎、叶绍钧、沈雁冰对“人的文学”文艺观的思考则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这缘于他们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开阔的理论视野,使其对于理论的

接受与新的理论阐释更为贴合实际,亦更具创造力,因此在前期文学研究会“人的文学”的文艺实践中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影响。

“人的文学”服务于现代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造,最终是要落实到创作实践当中,这是作为“创作篇”的第三章《“人间性”的发现:初期新文学的主题与形态》所着重探讨的问题。“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即新的“人间性”的发现成为“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的核心主题。由于对这一主题的文学表现,使周氏兄弟成为初期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引领者,引发了“人间性的发现”的创作热潮,并使“人间性的发现”成为“五四”前期“人的文学”最为主要的导向,贡献出初期新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实绩,同时开启了新文学总体的思想传统。初期新文学的主题与形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节《理想“人”、“人的生活”观的觉悟》描述了第一种类型,即“人的文学”家对理想“人”、“人的生活”发现的新的文学塑型。“人的文学”家率先阐明“这也是一个人”的新觉悟,将从未被当成“人”的最普遍的民众看作同样具有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独特的个体存在。但同时却又清醒地发现,所有人类成员都过着普遍的“非人的生活”,他们均缺乏真正“人”的意识,绝非人道主义理想所要求之“人”。不过现代人道主义的人性观念认定,即便再堕落不堪的“非人”也兼具着不会消泯的可贵灵魂,这能够保障他们被改造成为理想之“人”。于是“人的文学”家们着重表现了在人类爱感召下个体精神“觉醒”的“爱的奇迹”,鲁迅、周作人、叶绍钧等均有成功的文学表现。

第二节《“人间感”的觉悟》说明了初期新文学主题与形态的第二种类型,即对觉醒的人道主义“新”人的新情感、新感觉的文学塑型。新文化运动后国人精神发生彻底结构性转变,塑造、建构新的感觉世界与情感世界,即建构对于自然、社会、自身以及他人的全面的新的感受成为首要任务,新的“感觉革命”、“情感革命”是由“人的文学”文艺运动引发及引导的,周氏兄弟的创作与翻译成为其他新文学家最为重要的示范。“人的文学”着力塑造的感受类型,是每位“人类的一员”^①对于其他人类一员的感觉与情感,其核心是人类兄弟间“爱”的联系。“人的文学”家首先透视到其他人类兄弟灵魂的光辉,产生出“神圣感”的新感受,标志着“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人间感”发现的帷幕被拉开。在新的“人间感”中,除了“神圣感”之外,最为显著的既有发现“人间”正当联系时的欣喜与紧张感,和与他人的胞与之情,

①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1919年11月8日在天津学术讲演会讲演,1919年11月23、24日《民国日报·觉悟》,又载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

又有发现人类一体的神秘联系时的欢喜与惊异感等;同时,还有与之相反的感受,较为突出的是当新文艺家面对漠视“人间”正当“爱”的联系的社会现象时,所产生出的种种悲哀、无奈、激愤等情感。这两种正面、负面类型的情感原为新的“人间感”的一体之两面。“人的文学”家经创作将新的感觉与情感固化为文学主题、形态,周作人是发现及表现这些新的“人间感”最重要的作家,并为“五四”青年文艺家作出了最佳示范,叶绍钧、朱自清、郑振铎等均受其深刻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领域隶属文学思潮史,重要章节还涉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领域。著者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的自觉,拙著《“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的《导论·三 新文学西方渊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就曾着重阐明过几个层面的重要问题,比如在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方式中强调还原历史“现场”所使用的历史解释系统、文明解释系统,以及各类理论命题与思考框架等,以此作为解析历史文本的首选理论工具,并提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自己的世界文学/文化研究的命题”等,这些研究方式仍贯彻于本书写作过程中,这里不多赘述,本书中著者着重强调另一层面的重要问题。本书写作意图明确,尝试纠正以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思潮史研究的某些弊病,即不重文献、偏喜议论的风气,并尽力践行以实证为基础的观念史研究方法,以确保思想研究的准确严谨。在具体写作实践中,突出史料的考据辨证工作在思想史与文学思潮史研究中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对新旧史料文献的精细校勘考订成为本书研究最为重要的特点,这是著者针对“五四”思想史及文学思潮史研究存在问题的方法论选择。

长期以来学界对“五四”文学,尤其是初期新文学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著者认为这种状况的形成,不能简单诿过于学界对初期新文学总体成就重视不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文献工作的不足,一方面是缘于史料文献收集整理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史料文献的考据辨证工作问题严重,从而极易导致整体判断的失误,并形成固定的成见。细究起来,首先的问题在于,初期新文学活动的相关史料文献未得到真正系统的整理收集。第一,迄今尚缺少关于新诗、散文、戏剧、小说、文艺论的完善目录索引,即如当前最全的新诗编年史亦存在不少脱漏现象,其中较明显的是对初期新文学最重要诗人周作人作品刊发情况的说明仍不严谨;而且除了某些大型报刊外,大量初期新文学报刊也缺乏系统性的收集整理与索引编写。以上状况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完善的作品总集与报刊整理仍付

诸阙如。第二,在各类作家全集、文集、译文集等编选工作中,只要涉及这一时期往往就会出现捉襟见肘、严重错漏的情形。如《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的编选即为显例,著者发现关于“五四”前期郑振铎明确表达现代人道主义信仰的大批文献均未编入,因此极易误导研究者对郑振铎“五四”社会思想与文艺观念真实状况的判断,而其实陈福康的《郑振铎年谱》中早已有相关文献的索引。第三,对初期新文学出版物重视程度不够。初期新文学各类文集、选集、译文集的存世数量虽较多,但重新整理出版的工作却十分滞后,不仅缺乏系统规划,而且出版物也不成体系,尤为突出的现象是不太重视版本问题,不甚了解“五四”新文学家因思想变动频繁经常改动旧作的习惯,更对当时盗印与翻印猖獗的情况了解不足,结果往往因对版本问题缺乏分辨,导致不能准确判断作家思想与创作在不同阶段的特质,更遑论清楚分析作家思想与创作不断迁变的过程了。

应该说,一旦了解到史料文献的重要性,那么随着时间积累与知识完善,史料文献不充足的情况终能解决,相形之下,对史料文献考据辨证的严重缺乏则更难扭转,这成为初期新文学研究领域史料文献工作中最致命的问题。事实上,史料文献工作之所以严重影响初期新文学研究的水准,关键原因不在于“不全”,而在于“不准”,亦即现下可见的初期新文学主要史料文献基本不能直接使用。对此应如何理解?首先须说明史料文献学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所有未经专业化考据辨证的史料文献均不能直接使用,即便对于各类手稿和最初发表的文本亦需遵循此例,这是一项必须严格执行的技术要求。该项原则本是文献学的基本常识,不过对于尚无专属史料文献学体系建构的近现代文学专业,极有必要着重强调其作为文献工作首要原则的关键性地位。如果循此标准统观初期新文学研究领域现有史料文献,就会发现大多未经专业化的考据辨证,尤其建国后的众多出版物,无论是在现代文学文献学运动之前还是之后编辑刊行的,其所辑录史料的可靠性往往较差,甚至到了凡检校必有错的程度,不仅出现文字上的错漏,而且还有着更为严重的问题,比如辑录者对于文献的来历、原刊及原著的形貌、原始文献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作者经历和著述状况等都缺乏全面准确的说明,因此相关史料文献大多难以直接使用,这种情形可戏称为“不寻”、“不考”、“不注”。这样就决定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一方面,亟待重新审视有关初期新文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必须严防以未经专业化考据辨证的史料作为直接的文献基础。

著者基于对初期新文学研究领域内研究基础与研究现状的判断,对自身研究方法作出明确选择,一方面,著者在研究实践中严格执行标准,对于

所有需要的史料文献,著者首先返归文献最原始出处,随即作出专业化的考据辨证,如有必要,还需完成集注和集校,总之最大限度地保证史料文献的精确性。著者在研究工作中发现,考据工夫的精密化程度与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准确化程度完全成正比。具体操作方法不复细述,请参看著者依照严格文献学原则历时数年完成的《〈鲁迅先生评传〉校注》(《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期,第62—81页,正文2万2千字,校注1万字,217条注释)、《鲁迅逝世后最早的鲁迅传记——王森然〈鲁迅先生评传〉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粉饰逆伪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从王森然的《周作人先生评传》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王森然〈冰心女士评传〉考释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1期)。总而言之,著者尽力在研究实践中将史料文献工作的基本原则细致落实,使考据的精密化与研究的准确化相得益彰,紧密结合,以严谨的史料文献工作保证著者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历史“准确性”,藉以重新勾画“五四”文学与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抽演出新的观念形态与概念统系,同时为现代文学专属的史料文献学体系的建构做出有益的尝试。

著者个人的研究方法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著者积多年经验,针对现代文学专业史料文献工作惯常出现的问题,对具体的操作原则与工作准则做出一定的总结,以期尽量弥补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史料工作专业训练、史料学意识、史料工作原则等诸多方面的缺失或短板。这些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

另外,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具体化的思潮研究方式,著者不仅能够保证研究工作完全立足于精准史料,而且将对于文学思潮问题的研究完全落实到对文学发生发展的具体现象,以及对具体文学文本的细致分析解读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学思潮史研究的真正起点。

三、史料工作原则

著者在全面考证与校订初期新文学史料文献过程中,发现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在对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当中,存在着不少带有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因此亟需对史料工作的一些基本准则加以明确说明,藉以矫正偏差,促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专业化水准的提升。

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史料工作何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辨明史料工作与理论层面的研究阐释工作之间的关系。在著者看来,如果将历史研究视作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对历史的“还原”、阐

释活动与史料工作便是历史研究活动的一体之两面,共同为探究历史真实与追寻历史规律服务,两者绝不能被机械地分割开来。所以著者坚持认为,现代文学研究不存在孤立的史料工作,它由始至终都不能从对历史的“还原”与阐释活动中单独抽离出来。因此决不能单纯将发掘新史料视为史料工作的终极目标,甚至盲目追求“为史料而史料”,反而忽略了理论层面的研究及阐释工作——这样的认识与做法皆有悖于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

在明确“史料工作何为?”之后,就要遵循文献学的基本准则进行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史料工作。研究者必须充分自觉到史料挖掘整理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在新史料开掘中需多方考证并审慎思考,不能仅通过有限的材料便轻下断语;而在史料整理阶段则极其强调考证的精密与校勘的完备,以及阐释和还原工作的详实细致,因为藉此方能最终准确判定相关史料文献在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位置。很明显,史料挖掘整理需要研究者具备充分的细心与持久的耐心,原则上绝不允许将未经处理的史料发现匆忙公诸于众。著者对于史料整理还特别强调“在大历史中定位史料”的原则,具体而言,史料考订与研究工作极其需要“知人论文”兼及“知世论人”,即要求研究者回到大的历史当中,结合时势与作家的文学行为,准确定位史料的真实意义与历史价值。著者认为这理应成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最基本的原则,因为只有遵从这样的原则,一则史料所承载的混杂纠缠的历史信息才可能显露无遗,而史料也才能由此鲜活起来。

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史料工作最忌急功近利的心态与粗率、急躁的作法,其实这已涉及到史料工作的态度与伦理问题。迄今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中关于执业者的工作态度、工作伦理问题尚未得到专业化的强调,因此亟需在现代文学史料文献学建构之初反复郑重申明,并要对那些未经认真校读与精细考辩的“新史料”坚决说“不”,因为它们将污染现代文学研究的“水源”,罪莫大焉。

现代文学史料文献学还有一些特殊要求,譬如尤为强调有关文学外部研究的史料文献。著者认为目前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存在一些盲区,不少研究者的史料收集往往仅限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这样在无形中就为自己设置了壁垒,未能将辅助文学本体研究及作家研究的大量文学外部研究的史料文献置于视域当中,更遑论细加收集考证。这些文学外部研究史料包括现代作家在其他专业领域的言说与写作,以及围绕作家人格成长与作品形成的相关文献。在初期新文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十分突出,如有关“新青年”派与前期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人道主义社会观念的相关史料便很少引起注意,但实际此类文献异常重要,因为它们对解读“人的文学”文艺